

我是贾平凹。创作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，2014年也是如此。2012年底《带灯》问世后，2014年《老生》也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平均两三年写完一本长篇小说，网上都有人说我是“劳模”啦。

其实这一本《老生》，是烟熏出来的。我是吃过四十年烟的，加起来可能要烧个麦草垛。现在我老了，多回忆往事，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，树是闪过去了，但树还在，它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。

2014年对我是特别的一年。这一年，除了写作和开会，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领奖。上半年在领《带灯》的奖，下半年在等《老生》的奖。《带灯》基本囊括了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之外的大小文学奖项。而《老生》刚问世两个月，就接到了几个领奖通知。2015年，我肯定还会奔波在开会和领奖的路上。

《老生》写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记忆，这些记忆肯定是沉重的，但在小说的叙述中反而举重若轻，地是重的，天是轻的，虚的，这样作品才不至于就事论事。我所知道的百多年，时代风云激荡，社会几经转型，战争、动乱、灾荒、革命、运动、改革，为了获得温饱，活得安生，活出人样，我的爷爷做了什么，我的父亲做了什么，故乡人都做了什么，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，哪些是荣光体面，哪些是龌龊罪过，许多事一闭眼就想起，许多事总不愿去想，许多事又常在讲……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。而不愿想不想讲的，到我如今的年纪，又怎能不想、不讲啊！

我写这种乡土生活的书得心应手，但是写城市生活的书，就得靠年轻作家了。

说实话，三年完成一部长篇，这算不得多。我是五十岁后才稍稍懂得怎么写长篇，总觉得有东西写。我不大走动和应酬，就是写作。如果论潜心，也算得上潜心吧。作家，好比农民种一季庄稼，收一季庄稼，再种一季庄稼。虽然粮食已经够吃几年了，还得当种当收，这是工作嘛！（著名作家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）

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

我是贾平凹 我老了 怎能不想不讲啊



我是舒乙。在过去的2014年，我的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《开窍的日子》出版。这一年，我还在台湾两位大夫的帮助下，从右肾肿瘤的威胁中走出来，彻底治愈，又开始正常写作、画画、讲演和从事社会活动。

在社会文化方面，2014年，我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。比如文艺节目忽视艺术的欣赏、励志、反映社会和人性的功能，只注重娱乐甚至嬉闹的功能。

虽然“文学是人生教科书”这样的命题太过老套和狭隘，也过于强加和夸大，不切实际，但文学应是反映社会人生的，这应该不错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不朽，就在于此。文艺应有特殊的欣赏功能，还应有励志功能，在把读者感动之后，或笑，或哭，回过头来，要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到一些人生的道理。如果仅仅是娱乐功能，甚至嬉闹功能，则未免本末倒置了。

与此相关的另一现象是重要的晚会节目中太注意流行时尚，缺少交响乐、歌剧、芭蕾舞、钢琴、小提琴等高雅艺术，编排水平上显得比较低级，品味不足。每年我国都有不少优秀青年选手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奖，但是从来没有邀请他们在国内的重要晚会上亮相表演。

此外，有一个很坏的现象是读书的萎缩。玩手机代替了读书，甚至有人在听讲演、看演出时，也要掏出手机来忙活。对手机的依赖严重损害了人们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崇拜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侧面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颠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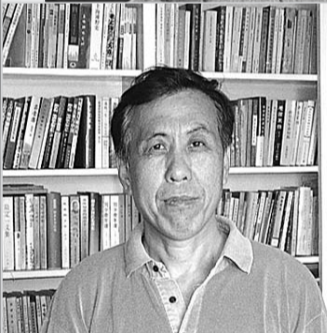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小书店萎缩，包括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著名书店都纷纷倒闭关门，活不下去。这和国外形成强烈反差。在巴黎、柏林、伦敦，小书店林立，到处都是，全然是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，也是一座文明古城的名片和骄傲。让小书店萎缩绝不是什么好现象，特别是正在倡导文明、提倡繁荣精神生活的时候。文学上有高地，没高峰。数量上的大繁荣不等于质量上的丰收，传世之作有待产生。

还有一个现象，文化名人故居里，尤其是作家故居里，基本上买不到作家的书，也买不到有特色的纪念品，究其原因，是上级文物部门一律不批准经营权，不能卖书和纪念品，不能开发票。这和国外的博物馆、故居纪念馆相比有天壤之别。后者卖书，卖独特的纪念品的收入可以占到博物馆（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民营的）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。博物馆不收门票，国营的由国家全部供养，固然是大进步，但为观众提供书籍和纪念品这个环节，同样不可忽视。

虽然存在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，但总体来说，2014年是给人希望的一年。10月份，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，对文艺圈的种种乱象起了纠偏的作用。习总书记讲话之后，我看到文艺圈反思得很厉害，这让人很高兴，感觉文艺从经济挂帅回到了正确的方向。对于2015年的中国文艺圈我充满期待，预计会有好的发展。（老舍之子、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、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）

本报记者 张亚楠 采访整理

我是舒乙 文艺圈 反思得很厉害



我是龙应台。我们处在一个被“不信任”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。

我踏进“文化部”的第一天，就是准备要走的。第一天工作就设定一个目标日，然后开始倒推工作节奏。我自嘲自己是“太后虎姑婆”，其实是因为我对下属工作要求特别高，比如说草拟博物馆法，初稿上呈时我会问：你有没有看英国对于博物馆的规范是什么？德国的、日本的规范有没有做过比较？请针对每一个版本的每一条做出对照表，交叉分析后，再呈，我们再来讨论。

这一切是因为能为自己的人民低头流汗服务，是人生最光荣的付出。虽然“在混凝土地里种花”备极艰辛，但仍是看见许多青翠嫩苗从地底钻出，迎向灿烂阳光。现在我离开了，我不是每天关心政治发展的人。

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还有我私人的理由。“文化部”的“第一里路”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，但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间，我隔周必飞台湾，“跋涉”到屏东乡下探视母亲。母亲2015年初将跨入90岁，我决定以更多时间陪伴她走人生的“最后一里路”。因为母亲的“最后一里路”只有一次，同属人生中不可错过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。

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，我满怀感恩之深情，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。即将重返自由，我要尽快把阳明山的家全盘作整理，赶快空出一张窗明几净的大书桌。要落实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的英文版，纽约经纪人已经等了我三年。

记得离港赴台前的最后一餐，我同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儿子抱头痛哭，两个人的眼泪就这样一滴一滴地落在半熟的牛排上。现在回到香港，更希望休养几个月再说。2015年7月，香港举办名家作家讲座。如果可以，一定来。别忘了我是半个香港人。

现在，我想反思台湾的、华文世界的文化政策，对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个贡献。我希望有人能把我关进一个舒服的房间，只开一个小洞送吃的，三个月就可以写出来，写完了才放我出去。我这人太过好奇，这三个月一过，我一定被其他事情给吸过去了，这本书就没了。（台湾著名文化人、作家）

本报记者 张榕博 根据公开报道整理

我是龙应台 把我关上 三个月写书

我是1946年生人，按照中国传统，2015年七十虚岁，就成了标准的“七零后”了。

回想2014年，做的事情还不少。第一是按部就班地读书，在读书基础上写作，有几十篇学术随笔，而且还完成了一部书稿，初步定名为《民国科学家》，另外还出版了一本书，《教育在民国》。

写书主要是乐趣，能够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，对好多社会现象发发言，这是我幸福的事。

第二件事就是跟读者互动很多。最近两年出了四五本书，像《民国老校长》等，因为这个原因，走了好几个省，主要任务是和读者见面。

其中一次让我印象深刻。山西有个很偏远的县，一般人不知道，叫岢岚，是卫星发射基地所在的那个县。当地县委书记买了本《教育在民国》，他让我去那里，给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作了两次讲座。我当时还挺奇怪，一个县委书记竟然会请我去。

后来想明白是咋回事了。其实党内一些领导干部，也是愿意听真话，不愿意听假话的，也是有了解历史，包括民国史的愿望的。

说到2015年，我是不愿意预测未来的。明天是什么样子，也许我就不在了呢？或者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呢？都很难说。什么都不是永恒的，只有生活才是永恒。（著名学者，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）

我是智效民，我还要为
民国书写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